



中国教育管理文库·学术前沿系列

褚宏启 主编

学校：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

——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探索及启示

徐建平 著



YZLI0890154554



教育科学出版社

ESPH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学校：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

——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探索及启示

徐建平◎著



YZLI0890154554

教育科学出版社
· 北 京 ·

出版人 所广一

责任编辑 刘明堂

版式设计 孙欢欢

责任校对 曲凤玲

责任印制 曲凤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探索及启示/徐建平著.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7

(中国教育管理文库. 学术前沿系列)

ISBN 978 - 7 - 5041 - 5074 - 5

I. ①学… II. ①徐… III. ①学校管理—教育制度—研究—中国 IV. ①G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 第 104648 号

中国教育管理文库. 学术前沿系列

学校：在政府、市场与社会之间——现代学校制度的理论探索及启示

XUEXIAO: ZAI ZHENG FU、SHICHANG YU SHEHUI ZHIJIAN

出版发行 教育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朝阳区安慧北里安园甲9号

市场部电话 010 - 64989009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电话 010 - 64989419

传 真 010 - 64891796

网 址 <http://www.esph.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制 作 北京鑫华印前科技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9 毫米 × 239 毫米 16 开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22.25

印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1 千

定 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目 录

绪 言	1
第一节 问题缘起	1
第二节 文献综述	9
一、研究重点和研究取向	9
二、研究现状和主要观点	12
三、研究述评和本书设想	21
第三节 核心概念	22
一、学校	23
二、政府	23
三、市场	24
四、社会	24
第四节 研究方法	25
一、研究视角	25
二、研究方法	26
第五节 逻辑结构	29
 第一章 学校与政府	32
第一节 政校关系中的政府理论	36
一、关于政府的界说——技术、利益和价值的视角	37
二、政府理论的纷争——自由与保守	57
第二节 权力与责任——政校关系的核心概念	87
一、政府对学校的权力	87
二、政府对学校的责任	100
三、学校的权力与责任	114
第三节 对于学校与政府关系的思考	120
一、我国政校关系的现状考察	120
二、政校关系的变革方向	133
三、政校关系变革的限度	139

第二章 学校与市场	145
第一节 学校与市场关系及教育市场化的理论省思	146
一、市场与学校——从经济的视角看学校	146
二、学校与市场——从教育的视角看市场	164
三、教育市场（化）何以可能——赞成派的呼声	168
四、教育市场（化）的理论缺陷——反对派的思考	171
第二节 前车之鉴——国外学校市场化的经验与教训	176
一、学校是如何与市场结合的——西方教育市场化的状况	176
二、市场侵袭下的义务教育：国外教育市场化的实践反思	189
第三节 国内对教育市场化的分析与批判	201
一、相关概念的明晰	201
二、学校与市场的结合	203
第四节 对于学校与市场关系的思考	206
一、竞争限制与秩序维护	206
二、效率代价和公平优先	215
第三章 学校与社会	224
第一节 社会参与与教育治理模式的转型	225
一、学校面对的“社会”	225
二、社会参与	229
三、教育治理模式向多中心的转型	240
第二节 学校与家庭	243
一、作为参与组织的“家庭”	243
二、家校关系的机理	247
三、家校关系的变革	256
第三节 学校与社区	259
一、学校面对的“社区”	260
二、社区参与机理	262
三、从社区参与看学校治理结构	267
四、对学校法人化的反思	275

第四节 对于学校与社会关系的思考	281
一、学校与价值共同体	283
二、教育利益在学校场域的多元化	289
三、教育的利益与秩序	292
四、教育利益的体制内实现——学校单位制度的改造	300
结语	309
参考文献	318
附件 1	333
附件 2	335
附件 3	340
后记	344

绪言

第一节 问题缘起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包括教育在内的所有公共事业领域快速发展。在教育领域中,义务教育领域占据着主要的地位。200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项公报中指出:“过于众多的青年人无法获得在 21 世纪中生存的必不可少的知识、能力和才智。要求教育更加适应现代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这一年龄群体的教育质量问题,今天已经是国家乃至国际范围内的重中之重。”^① 各国普遍达成共识,认为义务教育是对社会的最佳投资。

加强义务教育研究,首先是加强对作为教育组织的学校的研究。中小学校是各种关于教育和社会的理想之实现、目标之达成的最重要的载体。教育管理学的组织研究的偏爱也使得关于学校的研究成为焦点。教育组织,直接者如学校,间接者如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尤其值得关注和重视。这是因为,自从现代学校制度和义务教育制度在全球逐渐推广以来,绝大多数个体都要在学校这类教育组织形式中度过九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教育变革的中心任务是学校变革,即对学校进行实质性改造。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学校越来越成为改革的基本单位,学校更具自主性的运作,将使学校这一层面的变革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② 然而,有关学校研究的现状并不令人满

^① 2004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大会第 47 届会议公报和关于提高所有青年教育质量优先行动事项的建议》,第 2 条。

^② 杨小微:《全球化进程中的学校变革——一种方法论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76 页。

意，相反却使许多人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疑问和困惑。在一个快速变革的社会转型时期，教育组织是一个依存于社会的随波逐流的“变色龙”，或是“应声虫”，还是一个具有办学自主权、能够依法承担相关责任的“法人”呢？学校是一个类似于儿童手中的“玩具”，可任由改革者肆意地拆卸组装和尽情地把玩，还是一个内隐着有血有肉的个体生命的复杂体？教育组织是一个类似于专注经济利益的“加工厂”或者“无烟工厂”，还是一个“净化器”、“培养基”？^① 遗憾的是，一部分真正关系到学校生存、师生发展的本真问题，却被某些所谓的热点冲淡了、替换了、转移了。

研究学校首先要研究什么呢？在教育学层面，学校研究意指课堂、班级和学校的重建；而在更宽的理论视域来看，包括观念、制度和行为的重建。在笔者看来，观念不仅是指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等时髦的名词，也包括人们对于学校性质、对于学校在社会中与外部各种环境主体的关系定位。制度不仅表现为显性的教育法律、法规、政策和学校内部的规章，还包括隐性的教育领域的交往规则甚至潜规则。行为就是主要与这种潜在的规则相联系的，它遵循的是一种内隐的规则。在三者关系中，制度往往是连接观念和行动的纽带，它既是观念的体现，也是行动的指南。因此，我们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关于教育制度、教育法规与政策、（现代）学校制度的研究。人们希冀通过制度的改革、改造、改良和变迁来为学校发展和教育腾飞营造良好的秩序和环境。

学校变革与制度的关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校变革本身就意味着制度的变革。人们对学校的变革源于现实的教育教学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为了寻找更好的学校、更好的教育，必须对学校进行变革。在国外，各种名目的学校层出不穷，磁石学校、选择学校、街角学校、有效学校、新型学校，等等，这不仅是学校名称的不同，更体现学校制度的差异，各种变革本身就是学校制度的变革与创新。二是学校的变革需要制度的支持。一方面，变革的成果，如教育效率的提高、教育公正的普及和教育民主化的推广等，都要用制定的形式巩固下来；另一方面，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保障变革的顺利进行。教育的现代化也是制度的现代化，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核心问题，就是建立同现代化相适

① 张新平：《教育组织范式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

应的教育制度框架问题，而教育制度变革的成效往往直接决定着中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兴衰成败。^①当前，世界各国教育的主要制度形式就是学校，所谓教育制度通常主要指的也是学校制度，因此，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无疑会为学校内外部关系的调整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变革和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的重建，不仅有一个破除不合理的旧的制度规范的问题，同时还有一个对制度这一事物本身的重新认识问题。对于学校改革而言，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以“定格”的方式将改革的阶段性成果“积淀”下来，并以规范的形式引导下一步的改革行为，它是观念的体现，又是行为的保障。^②然而制度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具体政策文本的制定、解读、执行、修订上，不能仅对制度作“头痛医头、脚痛治脚”的应急性研究，更应研究和把握制度背后内在的逻辑。任何没有内在系统逻辑建构和理论关联性的教育（改革）必将因盲目而失败。

在学校变革的理论基础上，并不存在整齐划一的研究范式。组织行为学、系统论、治理理论都为学校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从学科出发，从哲学、心理学视角看，学校变革是一种思想变革；从社会学视角看，学校变革是多股社会力量的较量；从政治学视角看学校变革是一种权利的再分配。^③哲学、政治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法学、管理学和经济学都可以作为学校研究的学科切入点。

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人们追求自由、秩序、平等、效率等价值的过程，这些价值目标既是教育变革所追求的，也是社会变迁的基本取向。在教育方面，首先是要追求道德性，其他的目标都需要统合到道德上来才符合教育事业的基本特性和本真诉求。在此，道德已经不仅仅限于伦理学的、狭义的、只关乎个人德行的微观层面，而是将社会、国家、政府、公众等

① 田正平、李江源：《教育制度变迁与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2年第1期。

②③ 杨小微：《全球化进程中的学校变革——一种方法论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75、192页。

宏观的内容包括进来^①，否则学校在道德上不能独善其身。正因为此，本书强调学校变革的道德维度。在学校面对的外部环境中，政府需要道德，“成功的、大规模的改革就是要动用权力。但是，权力的运用一定要以有利于激发道德目标为前提”。^② 如果政府能履行教育投入责任，维护教育的公平和秩序，我们说政府是道德的。市场需要道德，没有竞争的伦理和道德的市场是非人性和不人道的，只能戕害而不是培育教育事业。如果市场能给教育发展积累资金并激励学习者的创新，而且并不导致金钱至上和对贫困的歧视，我们说市场是道德的。社会需要道德，既包括民主教育所需要的民主的社会环境，也包括社会的包容与和谐。如果社会能带来教育的民主，直至培养起每个学生的民主、合作与宽容的精神气质，我们说社会是道德的。道德有多个要素，它的实现也有不同的层次。“在微观上说，教育的道德目标就是使所有的学生的生活机遇发生变化；从宏观上说，教育的道德目标意味着教育必须对社会发展和民主有所贡献。”^③

怎样才能带来这些价值追求和道德目标的达成呢？人们习惯于追问学校背后各种“主体”的本质及其应具有的道德责任：政府到底应该是什么，市场应该是什么，社会应该是什么，它们都应在学校的发展和变革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传统思维中，人们总是相信世界上一切现象、一切表现都有一个最终的、可靠的实体作基础，无论怎么解释，都要找到一个什么“体”、什么“子”或是把它说成一个什么“性”，这种思维方式可以称作“实体思维”。然而，这种思维的局限性在于，很多社会现象往往离开所处的环境就难以解释清楚，它的本质需要在与周围的关系中才能得到界定，或者说它本身并不能代表什么，只是各种内外部关系才将它烘托并定格起来。因此，对大多数社会现象（包括教育现象）的研究需要从“实体思维”走向“关系思维”。诸如矛盾、价值、信息这些概念，都是一种“关系概念”，表达的是一种“关系现象”。从实体走向关系，就是把作为动词的“存在”问题，即研究一切事物是如何存在的问题，提到了中心的议题。这

① 有人认为，道德涉及微观和个人层面，伦理涉及宏观和集体层面，本书并未作这种伦理学意义上的区分。

② ③ [加] 迈克·富兰：《变革的力量——透视教育改革》，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7 - 198、288 页。

是哲学发展的前沿，它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是相互一致的。^①

对学校（制度）的研究也需要经历这种研究的思维转向，走向“关系范式”。就基本趋势来说，学校变革无论是宏观的谋划还是微观的运作，所关注的问题不是一个一个的要素问题或局部问题，而是种种“关系问题”，即学校之间、教育与环境之间，学校系统内部各要素、各部分之间的复杂的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②简言之，即围绕学校的内外部关系。学校的内部关系指学校内部各主体（校长、管理人员、教师、学生和家長）间关系，外部关系即学校与外部主体的关系，包括学校与政府、学校与市场、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如果说内部关系是教育的本真的和核心的问题，那么外部关系则是直接影响内部关系实现的必要前提。教育的改造往往是由外而内地展开的，通过外部关系的理顺才能影响并最终带来内部关系的改良。正如萨德勒所说，“学校之外的事情比学校内部的事情更重要，它制约并说明校内的事情”^③。因此，本书在关照课堂、教师、学生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学校的外部关系。这种关系表现在：

其一，在学校与政府的关系上，首先是厘清政府在义务教育治理中的职能。到底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强政府还是弱政府、全能政府还是有限政府、守夜政府还是拐杖政府、经济人政府还是公仆政府？就治理方式而言，采用法治、人治还是德治？在保障教育公共性和公益性的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许多理论领域的研究仍很不成熟。转变政府教育行政职能，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关键点。^④

学校自主权并不是凭空产生的，权力来自政府（授权、分权和放权），由此可能带来的利益损失可能会导致政府不愿意下放权力，权力的利得性

① 李德顺：《21世纪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趋势》，《社会科学辑刊》，2003年第1期。

② 杨小微：《全球化进程中的学校变革——一种方法论视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③ M. E. Sadler, *How Far Can We Learn Anything of Practical Value from the Study of Foreign System of Education?* Guildford, 1990, p. 11. 参见[美]艾萨克·康德尔：《教育的新时代——比较研究》，王承绪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④ 褚宏启：《审视现代学校制度》，载《中国教育管理评论》（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81页。

使得政府并不总是扮演“公仆”的角色，而经常会打着为民服务的幌子大搞政绩工程，为自己集权和揽利。在政府学校间的权力关系上，正式制度和应然的制度被弱化、掩盖、遮蔽了，各种非正式制度和私下交易却大行其道。政府的权力边界是模糊的，经常只是由官员个人的政治素质和道德觉悟决定，而非由一种保障学校和学生权利的机制作为制衡。而且，这种习惯还传染给学校，校长们似乎也经常热衷于集中权力以作为自己“干实事”的保障，而将民主当作因时、因地制宜的改革工具。政府的官僚/科层制度本身也可能在技术上排斥学校的自主和教育所需要的创新精神。在这样的政府—学校权力关系的作用下，政府会牢牢地将学校自治所需要的财权、人权和事权控制在手中，给出的却是对教育“负责”的道德理由。教育改革背后的理论逻辑经常是混乱的，自由主义抑或保守主义并没有清晰的理路，而只是作为强势一方——政府手中的权变的理论工具。可惜的是，许多理论工作者并没有担负起纠偏的职责，反而经常是鼓励那些“摸着石头过河”式的不需负责任的所谓创新思想。教育事业作为公共服务事业的特征和教育本身的道德准则，使得国企改革的思想 and 策略并不能简单地挪用到教育中来。对现代学校制度的基本问题，即学校与外部（尤其是政府）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将为政府再造提供了有别于企业制度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其二，在学校与市场的关系上，主要是探讨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可行性，学校与市场如何结合的问题。国内学者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讨论市场经济和教育事业结合的时候，喜欢用教育产业化、教育市场化、教育民营化的称谓。有人认为教育产业观是中国全民对教育发展上的一次“经济学”觉醒。^① 1993 年以来我国民办教育的大力发展使得许多人呼唤教育市场化改革的春天，而且似乎也和国际的潮流如出一辙，但这在我国仍仅是教育现象，从理论和本质上看，教育和市场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应该在什么层面上谈论市场对于教育的工具性价值——是产权还是市场运行机制或市场化倾向的管理制度？理论上研究的不足导致许多教育工作者至今仍观念模糊。近两年，人们讨论更多的却是教育的公平和教育中政府的责任，市场化的原则更多的是在学校微观的、管理的层面加以借鉴和运用，

① 张铁明：《教育产业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 页。

而不是贸然地从教育根本的体制性、所有制性质的变革。教育市场化理论似呈衰微之势。

不管学者们怎样争论,也不管关于教育同市场关系的理论是否明确,事实上在实践中,人们早已开始将教育同市场紧密结合起来了。表现在:①公办中小学的择校;②民办教育的大力发展,市场收费机制和资本市场化运作方式的引入;③混合性学校的发展,如国有民助、民办公助、名校办民校、独立二级学院等转制型学校的出现;④学校内部对企业管理方式和运营方式的借鉴,如全面质量管理、ISO9000族标准、教育集团化运作、教育股票、教育银行的引入。这里,既有对民办学校合理回报、产权归属、学校法人制度设计的争论,也有对因公办学校民营化带来的教育公平问题和政府缺位等问题的担忧。对于这些具体实践中的市场化行为,人们褒贬不一,毁誉参半。即使是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规定,也显得有些理论性苍白,甚至是逻辑性混乱。

自由主义者往往将政府妖魔化,保守主义者也容易将市场妖魔化。现在,有人在抱怨“教育是计划经济最后一块顽固堡垒”,也有人在担忧能否“在物欲横流、尔虞我诈、市场肆虐的今天让教育仍成为一方净土”。我们到底在政府和市场间如何抉择?中国教育的第三条道路究竟是政府管制下的传统福利型学校,还是市场完全放开的股份制学校,抑或是具有区域社会公益性特征的市民学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要求我们对学校这样的公共事业部门的性质进行明确的定位,对学校制度及其背后的学校外部关系进行重新设计与思考。

其三,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上,主要是研究家长、社区如何参与到学校教育事务中来以促进教育的民主化以及学校管理朝向多中心治理模式转移的问题。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认为良好社会的治理策略一靠法律,二靠教育。“教育是实现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好的统治者要把教育视为第一要务”。^①的确,教育有助于社会治理和社会稳定。今天,教育作为社会稳定器的功能怎样发挥?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论断,也是我国处于这一历史特定时期国家对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怎样在教育中体现和谐社会的要求和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可能主要仍需通过学校

① 杜志清主编:《西方哲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这一组织与制度形式的变革。

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校单位制度客观上造成了学校对政府的依赖、教师对学校的依赖、家长对教师的依赖问题。中国特有的民主生活模式（既包括宏观的一党执政和议行合一的决策机制，也包括微观的依托于工会、妇联、青年团、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等组织的泛政治化管理体制），使得学校与社会关系不能呈现出西方公民社会相对发达情况下的校本状态。虽然教育法中对学校法人地位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但现实中学校独立意志、独立人格以及与此相关联的独立财产和独立责任能力都是残缺的，在现有情势下，发展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如何在保持原有体制下的民主机制优点的同时进行民主化改造，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校民主化道路是当前研究学校外部关系所必需的现实思考。

在学校与外部的关系问题上，我们需要一种有说服力的理论。当前理论的重点应是反思，即将注意力转移到引导人们反思思想行为的假设、信念、哲学上来。^① 学校外部的关系主体确定为政府、市场和社会，既符合传统社会科学“国家—社会—市场”三分法，也和我们认识的常识相吻合。利用这种三分法形成的学校外部关系理论，应当能为学校的运作提供解释性框架，尽管我们不指望这种理论解释能够做到霍伊眼中（如同自然科学般）的精细，但至少应达到福斯特所描述的对学校这一事物的有意义的“统整”的效果。^②

学校的外部关系问题和现代学校制度问题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前者关系到理论的界定和澄清，后者侧重于实践的指导与应用。现代学校制度是“表”，学校与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是“里”。没有对现代学校制度的实践探索，学校外部关系的理论研究就会缺乏实践指向性和针对性；

① 张新平：《教育组织范式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8 页。

② 美国教育管理理论家霍伊强调理论的精确性，认为“教育管理理论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理论一样，提供了一般性的解释和研究的指引”。（参见霍伊、米斯格：《教育行政学》，王家通主译，台湾复文图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25 页）批判理论的代表人物福斯特（Foster, W.）强调理论在说明现实问题时的统合作用，认为理论的实质是“一种查看方式（a way of seeing），一种关于世界的见解，一种将我们生活中互不相干的事件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加以统整的工具”。（参见 William Foster, *Paradigms and Promises: New Approaches to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Prometheus Books, 1986, p. 12.）

没有学校外部关系的研究,现代学校制度研究将会因逻辑混乱而流于形式。当前,首先要做的不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试点)的匆忙上阵,而是脚踏实地地作一些理论性的探索。如果不能围绕现代学校制度作深入的关于学校与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理论研究,不能使改革按照自身的理论逻辑进行,仅仅“摸着石头过河”,或仅将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当作一个试错的过程,那么现代学校制度的确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论和实践价值。^①

本书希望通过对学校与外部关系的研究,把握公立中小学校在当前教育改革中的理想定位,既为学校自身发展提供努力的方向,也为政府管理学校以及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依据。这种努力将主要表现在对以下几个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第一,在学校与政府关系方面,政府应对中小学校行使怎样的权力?应尽怎样的责任?政府在义务教育发展中扮演怎样的角色?

第二,在学校与市场关系方面,学校如何与市场结合?市场机制如何才能与教育原则并行不悖?竞争法则和效率取向在义务教育中如何成为可能?

第三,在学校与社会关系方面,家庭、社区和社会公众参与教育的机理究竟是什么?有哪些可能的实现路径?

第二节 文献综述

关于学校与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关系的研究是一个很庞杂的领域,涉及教育领域(课堂内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教育技术和心理技术研究除外)的研究似乎均可囊括进来。问题域的聚焦是本研究工作首当其冲的任务。笔者这里就自己接触到的文献资料进行梳理和归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的研究设想。

一、研究重点和研究取向

应该说,1978年以来伴随着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我国的教育研究是

^① 徐建平:《现代学校制度研究述评》,载《上海教育科研》,2005年第7期。

不断深入的。而且改革本身往往也是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进行的。但不同的学者往往对教育改革和教育本身的关注点并不相同，因此其研究的内容和结论对于本书研究借鉴的价值也不尽相同。总体看来，现有相关研究的问题域包括：教育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学校产权和法人治理结构、校长权力、学生的多元发展和终身发展以及学校评价制度、教育中介组织建设、政府变革与政校关系、学校法、市民学校等。

透过这些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宽泛的问题域并未被聚焦。研究者的论域并没有能够以一种清晰的线索贯串和构建起来。在研究重点和研究取向上，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的“缺乏”。

(1) 围绕课程知识和教学过程的研究较多，但围绕学校与外部关系的针对教育机构和制度的深入研究缺乏。如吕型伟主持的“普通教育整体改革的实验与研究”、叶澜提倡的“新基础教育”研究^①、石中英的“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研究^②等都试图展现义务教育改革的现代意义，但均未能深入机制（机构和制度）及其背后的理论关系内部进行研究。

(2) 微观研究较多，宏观研究缺乏。研究者对教育的关注更多的是在学校这一微观层面，如刘云杉的博士论文《我是一个受教育者——一个人在制度化的学校中》就着力批判制度化学校中的中学生生存状态。胡慧闵的博士论文《指向教师专业发展的学校管理改革——上海打虎山路第一小学个案研究》，从观念、制度发展和自我发展三个维度对学校改革进行思考。杨小微博士的新作《全球化进程中的学校变革》从方法论的视角探讨了标准本位、市场本位和学校本位三种学校变革类型。宏观层面的系统研究仍比较短缺。英美国家均有直接以学校与外部（政府、市场、社会）关

① 叶澜的研究主张“把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充满生命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气息；把创造还给教师，让教育充满智慧挑战；把精神发展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校充满勃勃生机。”参见叶澜：《“新基础教育”推广性研究教师指导用书》，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② 石中英的研究强调课改中知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参见石中英：《知识转型与教育改革》，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系为题的研究^①，其中既有理论探索，又有实践反思。而在我国，大多还是就外部关系某一方面的研究。靳希斌主编的《市场经济大潮下的教育改革》一书，反思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经济转型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的教育改革，着重从市场体制和经济的视角探讨了教育各要素市场化改造的可行性问题。张铁明的《教育产业论》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出版的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教育产业化的著作，从教育产品属性、人力资本、教育劳动价值和教育公平的理论阐述出发，较为详细地分析了教育开发经营、教育投资、教育产权、教育股票及资本市场等国内教育改革热点问题，其中不乏对学校与政府、市场、社会关系重构及学校制度改革具有借鉴意义的观点。但这些研究也仅仅着重探讨了市场与学校的关系。国内在政校关系以及学校与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显然缺乏系统的论著。

(3) 在研究取向上，关注教育、关注教师和学生的较多，以学校为落脚点的研究缺乏。这种研究是“教育中心”而不是“学校中心”。人们似乎习惯于从教育为本一下子直接推导至以学生为本，缺乏对学校这一中间环节的重视。这种忽视的结果是，研究者容易仅将学校视作教育的制度性装置和工具，而学校本身的一些运行规律和自身独特的利益诉求被忽略和遗忘了。其实，研究者价值落脚点不同，其研究的内容和重点以及研究结论往往是有差异的。比如，如果站在政府的立场，必然会关心教育秩序和教育的公益性；站在学生和家长的立场，一般会认为教育服务和学生的全面、多元发展是终极关怀；而站在学校的立场，学校自身的运行逻辑则会落入研究者视野，包括政府和学校间的权力和责任的分配、学校教育教学机制

① 如英国学者 Whitty 的 “*Devolution and choice in education: the schools, the state and the market*”，美国学者 Chubb 和 Moe 合著的 “*Politics, markets and America's schools*”，Meyer H. D. 等主编的 “*Education between State, Markets, and Civil Society*” 等。再如在学校与社会关系方面，杜威等美国学者编辑出版的杂志 “*School and society*” 曾经出版达半个世纪之久。唐·倍根 (Don Bagin) 和唐纳德·R. 格莱叶 (Donald R. Gallagher) 等人 在学校与内外部人群的沟通、交流、宣传、影响、公关和评估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参见 [美] 唐·倍根、唐纳德·R. 格莱叶：《学校与社区关系》，周海涛主译，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应该说，国外的学校外部关系研究已经远远地走在了我们的前头。